

叶圣陶创作论略

万 嵩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 略论叶圣陶的文学道路·····	(1)
✓ 心灵的历程,前进的足迹·····	(25)
——读叶圣陶短篇小说札记之一	
✓ 园熟的技巧,简朴的语言·····	(48)
——读叶圣陶短篇小说札记之二	
✓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62)
✓ 叶圣陶诗歌的现实意义·····	(83)
✓ “木炭习作”见精神·····	(103)
——读叶圣陶的散文的札记	
✓ 叶圣陶童话的思想和艺术·····	(118)
✓ 叶圣陶文艺思想三题·····	(137)
✓ 叶圣陶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148)
✓ 叶圣陶创作的历史意义·····	(166)
✓ 叶圣陶创作的语言风格·····	(182)
附录一: ✓ 叶圣陶生平及著作年表·····	(197)
附录二: ✓ 叶圣陶作品选谈·····	(213)

✓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民的真实形象.....	(213)
——读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	
✓希望在沉沉的黑夜中闪光.....	(220)
——读短篇小说《夜》	
✓一曲爱国反帝的激情的战歌.....	(224)
——读散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浅谈《记金华的两个岩洞》的表现手法.....	(230)
✓深刻的思想，完美的艺术.....	(233)
——读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后记.....	(240)

略论叶圣陶的文学道路

叶圣陶是“五四”新文学战线上著名的老战士，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几十年来，他在文学运动，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创作道路是不断地探索、实践和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他的创作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调相一致，他的创作道路也反映了“五四”以来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道路。

步入文学领域前的教师生活

叶圣陶，本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一九一一年中学毕业，因家境贫苦，无力继续升学，便在甬直等地任小学教师，先后达十年之久。

在小学任教期间，叶圣陶当了“高等班的级任”，他“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同方法，自家也零星地悟到一点，就拿来施行。”关于叶圣陶的教育主张，我们从他的《如果我当教师》和《倪焕之》等作品中看出，显然是受到了卢梭关于争取人权，实现儿童自然发展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在《隔膜·序》中，有人就说他曾经一度“胸中充满着希望，……学校立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设备博物馆。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这种给儿童布置一种适宜

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寻求，去长养，教师只是从旁指导”的教育主张，无疑是富有民主色彩的。在教育方法上，他主张“诚意感化”（启发诱导），学用合一，反对高压，反对体罚，这对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与专制压迫，显然有着进步的作用。但这种教育主张因为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而已。

由于叶圣陶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与研究，“职业的兴趣越是到后来越好”，并使他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对于一些不负责任，“不知振作”的同行颇有点看不起。后来，他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觉得自己凭本事吃饭，没有尝过“钻营请托的滋味”，没有经历过失业的痛苦，更没有产生“何去何从，自萌短见的烦恼”，他觉得这段时间的“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他在工作上的一种“幸运”罢。

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也是一个作家从事创作的必要准备。十年的小学教师生活，使叶圣陶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有较为切实的体验，对旧教育的腐败与黑暗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对教育界各种类型的人物，从教育局长、学务委员、校长、教员，以至学生，都有较为细致的观察，这就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自己也说：“我做过将近十年的小学教员，对小学教育界的情形比较知道得清楚点。……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那些不满意的事情改过来，……于是自然而然地走到用文字来讽他一下的道路上去。”（《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不难看出，叶圣陶这一

时期的教师生活，也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是先成为教育家，而后成为文学家的。

早期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叶圣陶早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一九一四年开始创作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动机的引起，据他自己说，是由于读了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的结果。《见闻录》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是中国文学所没有的，或者说，简直是在“经史百家”之外的另一种“境界”，并对那种“境界”感到新鲜，愿意试一试。起初，他在《礼拜六》周刊上发表小说，编入《叶圣陶文集》第三卷的《穷愁》，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用的是文言，写的也多半是一些“平凡的人生故事”，“浅薄诚有之，如何恶劣则未必”，只是“不免贪懒用些成语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笔了。

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这个运动无疑给了叶圣陶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促使他积极投入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从表面看来，叶圣陶在“五四”前夕重新执笔写作，似乎是由于顾颉刚约他给北京的一种杂志（即《新潮》）撰稿所促成，实际上却是当时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浪潮激荡的结果。第二，促使他毅然抛弃了驾轻就熟的文言，采用白话写作。他后来认为白话“通俗易懂，一般人都能了解”，“它切适现代人的思想感

情，在发表的人跟领受的人之间，不致因文字上的阻障，发生彼此不相应的弊病。”（《扩大白话文字的地盘》）这都无疑是受了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影响的结果。反之，这些创作与活动，又促使他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实行家。他的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童话集《稻草人》，以及收在《篋存集》第一辑中的部分诗歌，就是他为新文学运动所作的最初的然而又是引人注目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一月，叶圣陶同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该会的“宣言”曾提出三项宗旨：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来看，倒象是一个同业工会的组织，但他们也有一个基本看法，即“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者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关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后来郑振铎曾经说过：属于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这就是说，被称为当时文坛的“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叶圣陶步入文学领域后，便以极大的注意关心现实生活，要求在作品中表现一定的时代色彩，并坚持“生活在先，文学在后”的创作主张。他的创作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批判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和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再加上他在创作中多采用冷静的观察

和客观的手法，而被人们目为“写实派”。作者后来也说：由于我在刻画人物时总是“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的心思”，因而，“这就有人……用写实派的名字加给你了。我能说些什么呢？”（《倪焕之·作者自记》）这里的所谓“写实派”，同样是说叶圣陶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可是，叶圣陶为什么会接受这种具有“暴露”和“批判”的特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呢？在客观方面，它同旧中国的悲惨现实紧密相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就在叶圣陶七岁（一九〇一年）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巨大的民族权益，如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使馆内及京榆道上驻兵的权利，公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后之税也为帝国主义所掌握。而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的赔款，更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搜刮和勒索，致使人民生活愈益贫困，社会经济愈益凋敝。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升学的现实，显然是与整个民族的灾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主观方面，则又与在强烈的爱国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直接相关。叶圣陶是怎样理解文学“为人生”的呢？这就是关心现实生活，要求在作品中表现一定的时代色彩。正如他在后来所说：“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这是文学的时代使命。”（《西川集·自序》）早期的叶圣陶虽然还不能明确地提出上述理论主张，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无疑是实践了这一文学主张的。总起来说，旧中国的悲惨现实必然激发作者对于黑暗社会的憎恶与反抗，而在爱国思想支配下的文学

“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又必然促使作者以更大的创作热情对于黑暗社会进行分析与解剖，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悲惨现实的结合，也就成为作者走向现实主义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具有爱国思想的作家，是很容易接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的这句名言，对叶圣陶也完全适用。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一切敌人，包括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精神文明等等的恨，一句话，这种导源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正是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叶圣陶的创作就是在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花果。

叶圣陶早期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主要是反对一切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反对封建性的剥削与压迫，暴露旧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并为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而呼号。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生》，便暴露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罪恶。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十五岁那年嫁人，不到一年便生了孩子，孩子很快死了。从此，她既要承受丧子之痛的折磨，又要遭到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逃到城里做了女工，可是不久便被夫家发现。为了捍卫自己用辛勤劳动换取的最起码的生活，她毅然决定与丈夫离婚，这是需要多么惊人的勇气！然而，她的这一决定因没有得到主人和父母的支持不得不归于失败，须知这是封建礼教密如蛛网的旧社会啊！尤有甚者，当她的丈夫突然死去，她又被卖了二十千钱以充“殓费”，而且被认为是

理所当然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迫害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二十年代旧中国农村中，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地租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种剥削，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少农民则往往因缴不起地租而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短篇小说《晓行》所反映的便是这样的现实。作品中的邵和之不是那种用软手段收租的田主，而是一个“惯用硬功的大王”，他给佃户们算出来的租子，就好比石头的山，休想移动一分，逼得佃户只好跳河。这是多么凶残狠毒啊！而作者对封建剥削的憎恨与愤懑，也正是从这种客观的叙述和细致的描写中表现出来。

与以上两方面相联系的，是作品还对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童话《稻草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作品描写了三个妇女的不幸遭遇：孤苦伶仃的老妇用汗水浇灌起来的禾苗，几夜间被蝗虫糟踏殆尽，换来的只有眼泪和叹息。肩负着生活重担的中年妇女“为了明天的粥”，不得不扔下有病的孩子，夜以继日地上岸拉罾。披头散发的青年妇女为了反抗赌鬼丈夫的出卖，不得不投河自尽。作者写的虽然是发生在夜间的一系列的不幸事件，它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在黑暗的旧中国的悲惨生活的缩影。作品的结尾写稻草人随着那个妇女的跳河而昏倒，正是具有人道主义深心的作者无限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但又深感无能为力，因而悲愤欲绝的具体表现。

叶圣陶这一时期的作品还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作了彻底的否定。在《夜》这首诗里，他把“幽晦”、“严密”、“包裹”世界的“夜”作为当时黑暗社会的象征，并认为它是桎

桎梏一切“弱小的心”的囚牢，因此，他号召人们冲决“夜”的“包裹”，毁灭“夜”的王国，让“光明的曙光与世界接吻，弱小的心才得救啊！”

不难看出，叶圣陶早期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所能范围的了。批判现实主义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这类作品揭露批判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描写了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和资产阶级兴起与瓦解的过程，并以它的令人赞叹的深刻性，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永久性”的怀疑，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生活，所以这种“暴露”与“批判”极不彻底，相反，倒是梦想在“暴露”与“批判”中寻找医治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药方，使它得免于死亡，因此它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要害，反而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叶圣陶的作品则不是这样。它批判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批判封建的剥削与压迫，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但决不是为了挽救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催促它的死亡，并对光明的未来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尽管作者这时的思想虽然就其实质来说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这种日益增长的革命因素的出现，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所以，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是属于“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了。冯雪峰曾经指出：“现实主义作为艺术观或作为创作方法，都和五四时代文学所担负的革命任务相吻合的。这样，五四新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优点，并加以发扬，加以现代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本国的来源，五四

新文学又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经验和方法，而加以应用和民族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世界来源。五四新文学就是在这两种来源的基础之上，从五四以来的人民革命的时代中，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创造力，独立地创造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辉煌的革命现实主义。”（《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显然，冯雪峰在这里概括的“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也代表了叶圣陶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特点。

由于叶圣陶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早期的创作中也有一些非现实的成份。这就是在《阿凤》、《潜隐的爱》、《一课》等短篇小说和最初的一些童话里，作者企图以“爱”和“美”来点缀人生，慰藉人生。他这样作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我们只要看一看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如谢冰心、王统照等人的作品也在追求“爱”与“美”的事实，就会明白这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的。由于叶圣陶等人当时的思想和阶级的局限，他们还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的复杂现象，错误地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社会的不平与不公，不仁与不义，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欢爱和温暖造成的，所以他们想用自己感受到的“爱”与“美”，作为解除社会的罪恶，拯救苦难众生的灵丹妙药，并借以安慰自己苦闷、寂寞的心灵。足见他们把“爱”与“美”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来追求，无疑具有反对封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爱”与“美”也有它的局限，即这种“爱”是超越阶级的“人性爱”，这种“美”从社会领域来说，是离开生活真实的虚伪的“美”，是唯心主义的东西。

正如茅盾所说：“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一时期，虽然也写‘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的条件。‘美’和‘爱’就是他对于人生的理想。这是唯心地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的这个评论，无疑是中肯的，恰当的。

然而，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于探索阶段的叶圣陶，并没有长期陶醉在“爱”与“美”的幻想里，在短篇小说《悲哀的重载》、《饭》，童话《鲤鱼的遇险》、《画眉鸟》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已经抛弃了这种幻想，进而面向现实，朝着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阔步前进了。

以“五卅”为起点的创作新阶段

在此以前的一九二一年，叶圣陶开始到中学任教，一九二三年，他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其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予了作者以深刻的印象，促进了作者思想的不断前进。

但我们认为，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到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政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叶圣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卅”运动作

为一个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在知识分子中必然激起强烈的反响。在上海，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直接参加了运动，在北京、广州、汉口等其他城市，知识分子不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镇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毛主席曾经指出：反动派总是充当人民的反面教员，它能使成群的人打开眼界。帝国主义当然也不例外。英帝国主义在“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彻底撕掉了它的“文明”的假面具，消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盲目崇拜，促使他们走上了更加彻底的反帝斗争的道路。在稍后的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血腥地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并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梦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幻想破灭，从而逐步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斗争。叶圣陶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跃进。这是因为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完成了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所以就能明确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也即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而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了。

在此期间，他还主编过“中国济难会”的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济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营救和援助革命者及其家属的统一战线的组织。这些社会政治活动，同样推动了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主流的靠拢，推动了作者思想的进步。

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直接制约着他的创作活动；作家政治思想的新跃进，也必然带来创作上的新阶段。在《五月三

十一日急雨中》这篇著名的反帝宣言书中，叶圣陶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对帝国主义者的强烈的恨，迫切地要求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为受辱的祖国雪耻，但是，要报仇，要雪耻，“象小鼠，如蜗牛”，躲藏在家里是没有用的，只有奋起抗争，才会有真正的出路。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赞扬了在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文章通过一系列的比喻和夸张，集中地刻划了青年学生的严肃、郁怒、坚强、勇敢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对于工人群众，作者更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加以描写：他“苍暗的肤色”，“眼睛里放出英雄的光”，他的话是那样的“精炼”，但又是那样正确和振撼人心，因此作者衷心地赞扬他“伟大”、“刚强”，说他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作者还以厌弃、蔑视的态度来描写恍惚在他的眼前晃过的那一小撮反动、落后人物的猥琐与卑怯，并以满腔的愤怒诅咒他们的灭绝、消亡。由于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因而坚信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中国“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要“齐心”，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进而建设一个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写于一九二七年的短篇小说《夜》，也是叶圣陶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和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作者还借助于映川妈的形象向读者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吓不倒革命的人民，反而会唤起他们的觉醒与反抗。我们看到，映川妈起初对女儿女婿被捕后的下落是既担心，又害怕的，可是当她知道他们确已惨遭杀害时，她那

仇恨的烈火立刻爆发出来了：“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事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给年轻的女儿女婿报仇。”特别是当她“参透”了烈士遗言的内容，了解他俩牺牲的意义时，“仿佛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他“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把他们留下的孩子抚养成革命的后来人。全篇虽有较浓的恐怖气氛的渲染，但给人的感觉是悲愤而不气馁，痛惜之中寄托着具有信心的希望。由此可见，这个作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尽管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但叶圣陶在作品中没有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而是清醒的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塑造了映川妈这一坚强的，感人的形象，表现出继续战斗的乐观精神。

长篇小说《倪焕之》写成于一九二八年，它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经历了“五卅”爱国运动和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叶圣陶，又开始探索他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历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了。

小学教师倪焕之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挽救贫弱的祖国，他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教育总是一个民族最切要的东西”，并把“一切希望悬于教育”，他却没有认识到，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教育，虽然能在社会改革中起一定的作用，但它绝不可能担当起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他在创办“理想学校”中所作的种种奋斗与挣扎，就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倪焕之毕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他不会长期消沉下去，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他又从乡镇走向城市，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走上了

人民革命的道路。然而倪焕之又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因而经受不起革命风雷的试炼。在蒋介石叛卖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王乐山惨遭反动派的杀害后，他完全陷入痛苦与绝望的深渊，终于患肠炎死去。

从倪焕之的一生经历中，作品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结合，拜工农为师，而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还必须认真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其中也包括批判和清除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否则仍将一事无成。这也是叶圣陶高于同时代某些作家的地方。

以上情况看出，叶圣陶这一时期的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者把对封建主义和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同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在“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运用文学的武器，对封建主义和旧的社会制度展开了无情的思想批判，给了它们以沉重的打击，但这个运动有其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把思想“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马克思：《致R（卢格——引者注）》）叶圣陶早期的作品也不例外。经过“五卅”运动，特别是经过“四一二”政变，他的创作便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第二，作品中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正面形象。无论是《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的袒胸工人，还是《抗争》中的打铁工人，或者是《倪焕之》中的工人群象，他们都是勇敢、坚强、团结和富有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的象征，是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的象征，是作者热情歌颂的正面形象。这显然是作者在“五卅”运动中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了工人阶级革命精神鼓舞的结